

《论语》文学研究

阳清 著

中華書局

《论语》文学研究

阳清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文学研究/阳清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

ISBN 978 - 7 - 101 - 09078 - 9

I. 论… II. 阳… III. 《论语》—文学研究 IV. I207.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007 号

书 名 《论语》文学研究

著 者 阳 清

责任编辑 李肇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1/8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078 - 9

定 价 30.00 元

序

打开阳清发来的电子书稿《〈论语〉文学研究》，我已年过耳顺，早已恬淡平静的心绪竟也颇为兴奋。此有因由：一是致力于《论语》研究几近十年的阳清终于有相关专著面世；二是称其为填补空白之作殆不为过，其选题之意义和价值都不容漠视。

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都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姑从周文化取代殷文化而言，理性精神高扬，这当然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大进步，但对文学发展而言伤莫大焉，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理性精神的高扬直接导致了神话在中原的湮灭。此后神话中所蕴含的想象、夸张、渲染、虚构、联想乃至幻想、形象思维等文学所特需的要素，在以儒学为“显学”的中原文献中几乎无存，甚至连语言美也因所谓“以文害义”而受到刻意地排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早期文学发展的路障。但是，作为人类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不可或缺的文学，和其他美好事物一样在曲折中一往无前，则是无法阻挡的。甚或在人们的有意或无意之间，它也会成功地穿越险阻，走向辉煌。

在中国早期经典性著作《论语》中，就突出地体现了文学的成功。书中既反映了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又蕴含了丰富的语言艺术，以及写人、叙事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可能是受到当时书写及传播等条件的限制，语言的简约、精当而又意赅旨远，可谓孔子呕心沥血的追求。拿和《论语》语言风格几近的《春秋》一并来看，这是显然的。更重要的是，为达到其记言或记事之目的，进而追求语言的形象、生动以及修辞手法等，似乎是上了一条不能自己的轨道。殆可谓是受到了文学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的支配，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尽

管夫子有言曰“辞达而已矣”，《论语》似乎无意为文，但放在中国文学史上来看，其文学成就创造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且对后来的论说散文及叙事散文的发展，都有着深远而多方面的影响。这些艺术财富本该珍视，但遗憾的是，两千多年以来在以经学为主流的学术文化研究中，人们的眼光都聚焦于《论语》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意义的阐释，鲜有人致力于其文学价值的全面探究。近现代大概亦因《论语》“不是成熟的散文”，对其文学价值的全面探究者至今阙如。所以，这个选题是有价值的，阳清也是有学术眼力的，为之负轭而行也更是值得的。

读完了全部书稿，愚以为该书特点突出，举其要者而简言之。

其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总体把握。对于这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工程，没有宏阔的学术视野是无法毕其功的。从书稿来看，作者在书中的表现应该说是出色的。他对《论语》研究的全程精爬细梳，并依此概括了历代《论语》研究的特点、趋势、成就和不足。尤其是对先秦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先秦典籍作为文化载体的综合功能”。由此，书稿确立了“阐发《论语》在古代文学发展链条上的特殊地位”之主旨。在这个宏观把握的格局中，作者又对《论语》文本做了深入的微观阐释与探讨，对其文学表现做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归类、排比和解析。这些都为“充分挖掘这部儒家经典的文学资源和隐性财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为全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清醒的判断、意识、定位、思路以及角度、方法、途径和目的，在书中都得到了丰富而生动的体现。这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这部儒家经典在文艺思想和文学实践方面的积极作为，也从一个新的侧面再次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魅力。当然，书稿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早期散文的系统性研究，让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这部儒家经典性著作对后来相关人文科学的重要影响。

其二、执儒家哲学之牛耳，探《论语》文学之幽微。这不仅是该书又一重要特点，以时语言之，亦可谓“亮点”。在这部以《论语》“文学”研究为目标的著作中，作者没有登高就叹山险，临水只赞河深，割裂

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自己的眼光和思维囿于一隅之中。《论语》中最丰富、最深刻的是儒家的哲学思想,基于此,作者紧紧抓持着《论语》哲学内涵与文学表现之间如血肉般难以割裂的关系,其立论依托于哲学思想的整体建构。在该书的导论中,作者强调,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关乎文化意识的根本因素”,“造就了儒家哲学光环下的文学境界”。并进而指出:“《论语》的文艺思想是早期儒家哲学关照所致的初步理论成果”,《论语》对人物形象的刻划乃至价值判断“亦奉行了早期儒学的典型标准”,“都始终被笼罩在其哲学光环中”,反过来说,《论语》“原书固有的文学性及其生成机制全都指向其‘一以贯之’的哲学建构”,《论语》中多样的表达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为孔门哲学的阐发、生成以及传播等,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这表明,作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作用的,互为表里的。作者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无疑是科学的,也符合《论语》乃至中国早期哲学典籍的一般特点。所以,书稿对《论语》不是进行孤立的、浅表的纯文学层面的探讨,而是在对《论语》艺术技巧、手法、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探讨的同时,使我们能体悟到儒家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思想,提升我们对《论语》理性认识的深度,更多的挖掘出沉隐在文本之后的文化内涵。《老子》论“道”之特点曰:“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此语用之于《论语》,亦庶无可,我们要辨其微、会其妙、悟其玄、得其通,该书作者的这一把持可谓得其津梁矣。

其三、从人文哲学的高度对《论语》中“人”的全方位透析。这是该书又一突出特点。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永远是一个博大深邃的哲学命题。因为它包含着对人的本质认识、价值判断,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类期盼的社会目标等,这些当然都影响甚或决定着史学、文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但这个认识的过程也是艰难而漫长的。即如对人自身的价值的判断,从奴隶社会的一个奴隶等于几束丝加一匹马,到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进而追求大同世界、和谐社会,至少经历了三千年。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先秦散文中,对人的价值判断不断表现出台阶式的提升,迨至

《史记》，更表现出质的飞跃。《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撰写体例的创立，首先是司马迁对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地位的确认，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提升。我们再反观《论语》，可以说，在此前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教育为职业，以提升人的品格、价值为目标的孔子，对人的表现和认知是最丰富，最深刻的，其中还包涵大量的足以启发人文思考，推动后来人文情怀、人文关照得以发展的隐性因子。《论语》中对各色人等的悉心描写和褒贬，也传达出了最丰富的人文信息。当然，因为受时代及各种条件的限制，《论语》中这些丰富的思想，有许多还表现出零散性或模糊性，打个比方，它还不是999纯金铸就的金砖，但它确是无数散发着耀眼金光的金沙。《〈论语〉文学研究》的作者，以广阔的人文视野，认识到了《论语》的这一特点，也紧紧抓住了这一特点，因而成就了该书这个显著特点。在对《论语》人物形象、心理、性格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论析了这些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文化秘密、情感秘密、存在秘密以及理性深度秘密。

其四、对《论语》文学探讨的系统性、全面性以及深度都是空前的。《论语》文学特色和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为我们塑造了众多人物组成的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人物艺术长廊。从文学而言，这涉及到人物描写、叙事、语言运用等基本手法以及实践这些手法的丰富的、富于创造性的技巧。围绕这些，该书作者对《论语》中相关的典型例证做了倾其全力的打捞。以此为基础，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书中人物的形象、性格、及意义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如对书中重中之重的人物——孔子，采用专章论析，并分为五个方面，每个方面又有若干层次。其细致深入于此可见。又如对其他一些人物又做了“隐者”、“孔门弟子”两个群体性的归类，在比对与对立关系中，不仅彰显了他们鲜活的形象与性格，也生动地反映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生存状态以及隐士们与孔门群体的矛盾关系状态。对《论语》中涉及的文学技巧层面的艺术探索，该书也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列为语体、叙事、情愫、韵感、润饰等五章分论之。每一章都分列为三到五个

方面,每个方面又从若干个层面深入进行具体的透视分析。如仅就修辞来手法说,就达 16 种之多,并指出《论语》“几乎使用了后世可能出现的所有修辞手法”。再以《论语》“写人的方式”而言,作者更是在该书中做了长篇的专论。此处不再赘述。相信读者在阅读之后,自然会分享到其中艺术的、哲学的趣味和快乐,也会得到收获和启迪。

另外,搜求之广泛、引证之繁富、论释之翔实等,也都是此书的显著特点。

该书作者出身于湖南农村一个十分困难的家庭,其为学之路充满了艰辛,但他不为时俗所浸染,清贫自守,以学为乐,诚如他在书中所言:“检读语录,自有绝妙感受。”夫子亦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殆亦斯人之谓也。近些年来,在经历了耕耘的艰辛之后,作者终于得到了丰硕的回报,不断享受着丰收的快乐。百尺竿头,当更进一步,勉之,勉之。

是为序。

吕培成

2012 年 11 月 9 日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甲编 文艺思想篇	
第一章 辞达而已:语言追求	23
一、言行一致与表里如一	23
二、日常口语之其他要求	27
三、修饰润色与辞达而已	30
第二章 里仁为美:审美理想	35
一、由好色转为贤贤易色	36
二、中庸之道与美学原则	40
三、诚挚躬行与情感取向	44
第三章 温柔敦厚:诗教精神	49
一、断章取义与诗之运用	50
二、兴观群怨与社会意识	55
三、思无邪及其诚正标准	61
第四章 正声雅音:乐教风旨	67
一、乐其可知与音乐修养	68
二、诗乐同构和礼乐并举	72
三、从礼崩乐坏到成于乐	77
乙编 人物形象篇	
第一章 众星拱月:夫子神貌	85
一、矢志不渝之入世情怀	86
二、乐观自信之人生态度	89

三、机敏睿智之儒者风范	94
四、平易不拘之良师益友	97
五、夫子之平凡与世俗化	101
第二章 烘云托月:隐者风尚	106
一、隐士与逸民对立统一	107
二、隐士群体之心态还原	111
三、隐逸形象之典型意义	114
第三章 各有千秋:孔门弟子	119
一、德行颜回之安贫乐道	120
二、言语子贡之通达无碍	124
三、政事子路之伉直好勇	128
四、文学游夏之鸿儒硕学	133
第四章 旁见侧出:诸色人等	139
一、古贤人及其轨物范世	139
二、为政者及其僭越无道	144
三、多种人物之综合呈展	147
四、人物品评之史学范式	151
丙编 表达艺术篇	
第一章 语体:雅言与语录	159
一、书面语与口语之交融	160
二、雅致、质朴而又精警	163
三、语录形态与文学价值	169
第二章 叙事:实录与叙述态	177
一、叙述质素及其表现性	178
二、叙述特质与写人方式	180
三、叙事性以及故事意味	183
四、叙事策略和视角参与	186
五、叙述品格与文学定位	188

第三章 情愫:语气与情感流	193
一、情感与理性交织相生	194
二、反复咏叹之深情款款	198
三、虚词多用寓复杂心境	201
第四章 韵感:韵律与节奏美	205
一、韵语使用与同字相协	206
二、韵散结合与句式节奏	210
第五章 润饰:文采与修辞法	216
一、比喻格及其灵活运用	217
二、映衬、对偶以及对比	223
三、各种修辞之自然糅合	227
四、格言警句之字字珠玑	233
五、成语经典之点睛夺魄	236
余论	240
一、《论语》写人方式析论	240
二、汉魏文献中之孔子歌	253
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78

导 论

在中国、华人社会圈乃至全世界,儒家智慧已经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孔子是儒家智慧的先驱,《论语》则是早期儒家和孔门意志的载体。《论语》影响着后世的根本因素,在于其作为显学的儒学思想,原书凭借着“仁”、“礼”、“孝”、“忠”、“中庸”等各种哲学范畴及其伦理思维,对国家、社会和人生加以引导,演绎出传统社会哲学的理想图景。由此:《论语》首先是理性而抽象的。

尽管这样,《论语》所呈展的文化张力,不仅是儒学所致,而且表现为原书在文学创作和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位置——《论语》亦是感性而具体的:其写人、记言、叙事、情意、韵感、润饰,等等,一方面因其殊异于同时代其他诸子作品而自成特色;另一方面又因其文本典范意义和历史遗响,连同其史学意识、文学观念、艺术精神等,足以形成某种表达效应、批评效应、主体效应以及文化效应。

比较言之,两千多年的文化长河中,作为哲学文本的《论语》,已经被无数人说过无数遍,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作为史学尤其是文学的《论语》,沉隐于其“文本之后的文化秘密、情感秘密、符号承载的存在秘密,以及它将会展开和透露的理性深度秘密”,则“还远远没有被揭示出来”^①。从这种意义上说,全面、综合而又系统地探究《论语》的文学性及其形成机制,藉此启发整个先秦文学的宏观阐释,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此即拙著撰写的缘由。

^① 金纲著:《论语鼓吹》(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欲探究《论语》的文学性及其形成机制,首先需要辨析孔子时代的“文学”本义。

众所周知,孔氏所谓“文学”,往往有别于近来以来的文学概念。据《雍也》“君子博学于文”^①、“质胜文则野”,《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颜渊》“君子以文会友”,《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先进》“文学:子游,子夏”,种种表述,其中的“文”、“文章”抑或“文学”,并非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为主要形态,藉此反映客观生活、真实表现内心情感的艺术,而是在某种具体语境下,特指周代的礼仪制度、文采、文献以及学问等。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论语》论及“文”、“文章”抑或“文学”,既不失为早期儒家文艺观的时代演绎,抑且启迪了自觉的文学观念。换句话说,即便我们与孔子时代相隔遥远,但无法否认《论语》之“文学”与近代以来“文学”的历史关联。对此,周亿孚指出:“孔子的意思,是将文、文学、文章合而为一,都是泛指一切典章、学术,其意义是一样的”,“这种文学思想沿袭下来,便形成后世明道经世和实用主义的文学观念”^②。基于这种理解,以近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为基准,继而审视和反观《论语》的文艺思想、文学实践和文学价值,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更值一提的是,孔门在“文”、“文章”抑或“文学”方面的高度修养,不仅直接孕育了早期儒家的文艺观,而且影响着《论语》的文采及其文学质素。郭预衡认为,“《论语》的文章,虽然不是孔子自著,但由

① 拙著所引《论语》文本,均参考[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

② 周亿孚编著:《中国文学概论》,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1年版,第2页。

于孔子尚文,他的门人也有人专攻‘文学’和‘言语’,所以,辑为一书,就特别富有文采”,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由此他得出结论,“《论语》一书对于后代文章影响之大”,其实“不在其思想影响之下”^①。这正是孔子时代“文学”本义之于后世“文学”的积极意义。

那么,《论语》何以拥有文学质素?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先秦典籍作为文化载体的综合功能。也就是说具有明显哲学意义的作品,其实有可能生发出史学价值和文学意蕴。另一方面,与前者相关的是,我们还须理解哲理散文的理性表达和逻辑思辨,其实并不排斥形象思维和具象美感。^②相反,为了更好地诠释思想,哲理散文甚至有可能借用艺术形式技巧来辅助宣教。此外,从文化坐标看,《论语》虽属语录体哲理散文的本位阶段,却位处《左传》之历史散文和《诗经》之文学结集之后,无疑受到叙事文化和诗性文化的双重浸润。

欲探究《论语》的文学性及其形成机制,其次还需要辨析原书的称名与结集。

关于前者,据《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论所语之言也。”^③又据《文心雕龙·论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④关于后者,据《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

① 郭豫衡著:《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② 关于这一点,万陆强调:“若从中国古代学人的思维实际出发,主要运用逻辑思维的理倒是不但不排斥形象思维,而且有时还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理性观念往往与形象相伴而生,带着鲜明的感悟特色。”又曰:“我们那主要依赖抽象的逻辑思维的论说性散文也不但有着具象的形式,而且还具备美的因子,既可开人心窍,又可动人情怀,也像记叙性散文一样可以成为美文。”(万陆著:《中国散文美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③ [汉]刘熙撰:《释名》卷六,《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00页。

④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6页。

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①又据《隋书·经籍志》：“《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辑而论之，谓之《论语》。”^②据此，我们不难看出：

其一，因为载录“孔子与诸弟子所论所语”，实乃“述经叙理”、“伦理无爽”、“言合于道”之类，《论语》遂以哲学义理为旨归。通过“一以贯之”的学术演绎方式，其中可能蕴含着儒者对言辞、审美和诗乐的初步理解，从而展示出儒家特有的文艺思想；

其二，因为记叙“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抑且缘于语言与人物之间的必然关联，《论语》使用“语录”（独论或对话）这种媒介，就有可能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付诸文学实践，一定程度上还原孔子、孔门弟子以及时人的神貌；

其三，因为《论语》源出“夫子既卒”后的“门人追记”，对于编撰者来说，其中有关“私相讲肄”的场景记忆犹深、宛如昨日，至于重要人物的言语和相关情节，抑又通过“书之于绅”这种方式而真实可感，那么就有可能在记言和叙事方面超越同时代诸子的哲学境界；

结合第二点、第三点，如果说《论语》在写人、记言、叙事等方面的文学质素，有可能吸收了早期史学叙事的相关经验，并且付诸于艺术实践；那么，因为《论语》历经孔氏“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辑而论之”，而且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文学修养非同一般，基于周秦时代诗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影响，还有可能在文本的情感、节奏、韵律、修辞等方面有所讲究，最终使这部儒家经典传之久远。

关于《论语》论纂工作的具体情形，历代学者看法不一，兹不赘述。清人刘宝楠曰：“窃以先圣存时，诸贤亲承指授，当已属稿，或经先圣笔削，故言特精善。迨后追录言行，勒为此编，作之者非一人，成

① [汉]班固撰：《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7页。

②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39页。

之者非一时。先儒谓孔子没后,弟子始共撰述,未尽然也。”^①这种观点亦可谓合情合理。笔者以为,正是基于孔门在“文”、“文章”抑或“文学”方面的高度修养,基于儒家文艺思想的时代实践,基于早期儒者对叙事文化和诗性文化的吸收,《论语》在诠释伦理哲学的不经意中,造就了重要的文学价值。

欲探究《论语》的文学性及其形成机制,或许还需要分析早期儒者的传道方式和后世读者的接受心理。孔令顺研究得出:《论语》作为从诘屈聱牙的《尚书》到平淡流畅的战国散体文学之间的一部代表作品,在散文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传承意义。《论语》文学性的生成原因,除却其成书特点,除了孔子睿智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及其文艺观和美学观影响所致,出于授课、言谈教育的需要,因为读者以一种崇敬的接受心态去阅读《论语》,无形中也增强了其文学性。^②要之,《论语》的文学性既是客观存在的,亦是历史必然的,其文学功能正是在上述文化机制下自然而然地生成。

二

毋庸置疑,《论语》的哲学价值超过了文学价值。究其缘由,这里存在着一种关乎文化意识的根本因素,亦即这部儒家经典,恰好介于史学本位时代与文学本位时代之间。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说明观点,这里引用程水金的结论:“先秦散文在思维模式上也有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从既无因果联系,又非相似联系的原始思维,到以时间为参照系的时间——因果思维,再到以时空结构作为参照系的时空——相似思维,遵循着人类思维从混沌到有序的发展规律。”^③依据中国早期散文的类型及其特点,程氏

① [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后叙),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7页。

② 孔令顺:《试论〈论语〉文学性的生成原因》,《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

③ 程水金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第一卷),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所言的确科学而又客观,因为他把先秦文学视为神话传说、历史散文以及哲理散文的前后逻辑序列。与此稍异的是,笔者认为:先秦文学可前后划分为史学、哲学、文学等三种文化本位阶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种文化本位往往涵括并且利用前代的文化意识,由此呈现出一种继往开来的文学态势。

关于周秦典籍兼具文、史、哲三种意识形态之说,兹不赘述。从整个文化意识的历史嬗变来看,最先进入人类文明的书面成果,当是史学本位时代的记事。史学记事历经时间最长。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史学本位的最早载体,上古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个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易经》是史前符号语言时代的现实投影,亦即殷商社会的实录^①;《诗经》可谓周代史学本位的特殊文本形态^②;至于《尚书》、《春秋》、《左传》诸书,则不失为史学本位时代的典型著作。史学本位时代及其记事的文化意识,在于如实地陈述社会历史,并且藉此彰显出惩恶扬善的价值功能。

史学本位的前进方向,正是以诸子百家为社会主体的哲学本位时代,期间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说理著作。章学诚在谈到战国言论时说:“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③事实上正是如此。哲学本位时代及其说理著作的文化意识,表现为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集中诠释哲学思想。以哲学思辨为叙述激励机制的战国诸子,通常伪托寓言故

① 刘金万:《〈易经〉是殷商社会的实录》,《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4期。

② 因为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所致,上古神话和《诗经》常被看做具备文学意识的作品,其实不然。作为一种神圣的历史叙事,神话本身一度被原始居民当做曾经发生的史实存在,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诗经》及其现实主义情怀,亦是文学不自觉状态下的实性叙事。真实的情况是,上古神话和《诗经》主要实践着记录过去社会事件或历史故实的功能,直至战国末期的屈原和宋玉,才开始进入个体意识的文学创作。

③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经解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页。